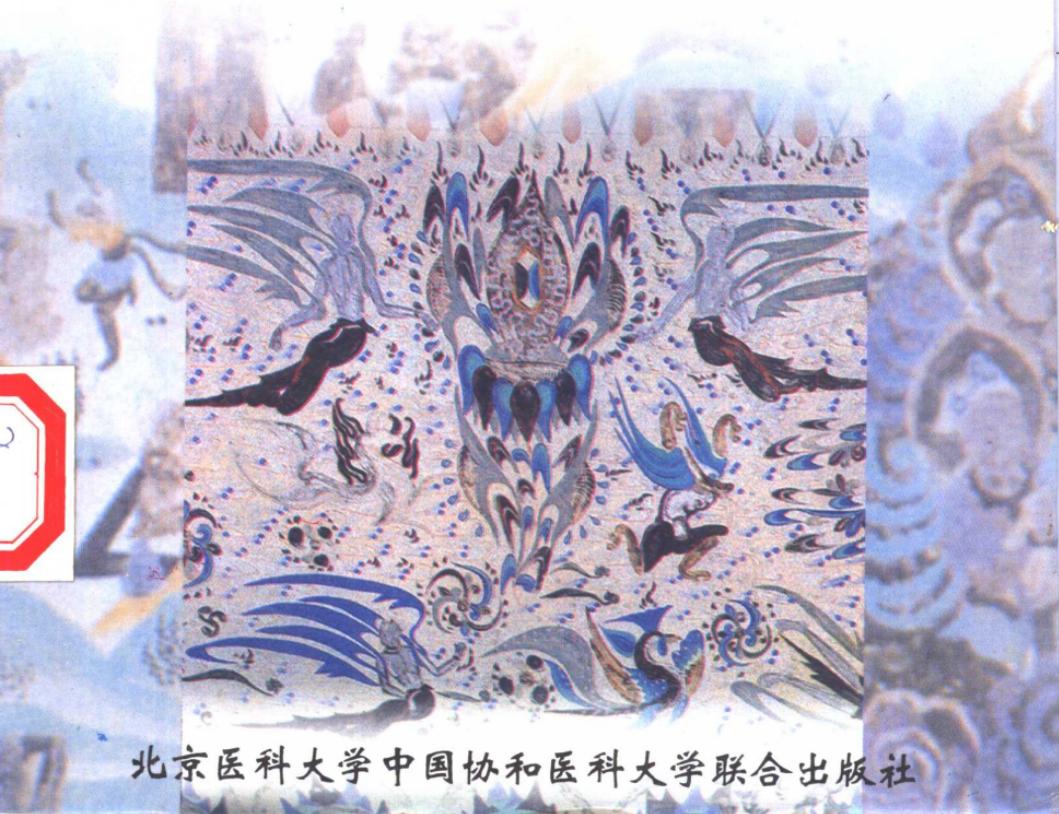


王淑民 编

#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 ——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

王淑民 编

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联合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王淑民编. - 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8

ISBN 7-81034-954-6

I. 敦… II. 王… III. 方书 - 中国 - 唐代 IV. R289.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0413 号

##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

---

作 者: 王淑民 编

责任编辑: 袁 钟

---

出版发行: 北京医科大学 联合出版社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28583)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

ISBN 7-81034-954-6/R·952

---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它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从敦煌医学遗书中选录较为完整医方 475 首，将其按主治疾病分类编排，共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黄胆病方、反胃方、呕吐方、消渴方、蒸病方、霍乱方、蛊毒病方、诸痢方、内药方、头风方、房中方、妇人方、小儿方、男子诸方、养生方等 65 类。每类医方前多设有解题，介绍此类疾病的症状、致病因素、古文献对此病的相关记述及方剂源流等内容。每方后加有“注释”和“按语”，注解原方脱、衍、讹误及难懂字词，解释方中用药机理。这是一部简便易读的敦煌医方书，适合广大医务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阅读使用。

## 前　　言

敦煌遗书自 1900 年被发现以后，精华部分被英、法、俄、日、德等国探险家盗购，被收藏于这些国家的图书馆。解放后，北京图书馆将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斯坦因编号的敦煌遗书复制回国。本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在中国医史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指导下开始收集敦煌医学卷子遗书的复印件，并协助马先生编著了《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此书首次全面为医学残卷命名，并对所收集到的医学卷子进行了文字考订与少量的文献考证。90 年代，又与马先生等同事合作编著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已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这两部书中方剂卷子与其他各类医书合编在一起，又无方剂索引，故临床医生与方剂研究人员不便检索，不能很好地发掘敦煌医学的精华，使之古为今用，故萌发编写此书的想法。

本书从敦煌近百种医学卷子中选录较为完整医方 475 首，将其按主治疾病分类，共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黄胆病方、反胃方、呕吐方、消渴方、霍乱方、中风方、心痛方、房中方、妇人方、男子诸病方、小儿方、养生方等 65 类。每类医方前多设有解题，介绍此类疾病的症状、致病因素、古文献对此病的记述及方剂源流等内容。卷子医方原文用大一号字录入，注文、按语次之，以示区别。方中“□”，代表缺一个字；“□”代表缺文数不详。医方后用括号标出其出处，例如（P. 3930）、S. 1467），“P”为法国伯希和简称，其后数码为其从中国盗购的卷子编号，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S”为英国斯坦因简称，其后数码为其从中国盗购的卷子编号，现藏英国伦敦图书馆。在本书附录中可据此编号查找《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为该卷子所作的命名。“注释”，内容包括原卷子的脱、衍、讹误，难字标音加释解，病证名、人名、书名解释等。“按语”，主要包括方解

及古代文献与本方相关的文献资料；有的方剂残缺较多，难于理解，多在按语中引录隋唐医方相同相近者加以印证，为读者提供参考资料，免去读者考证之苦。总之，一切从读者需要出发，努力编辑一部简便易读的敦煌医学方剂书，使千年之后的今日学者，能读懂隋唐人所著医方。

在编写此方书时，承蒙我的老师马继兴先生多方指教，又受到袁钟博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王淑民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 绪 言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是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医学卷子遗书的一部分。敦煌莫高窟，又名敦煌千佛洞，位于今日甘肃省敦煌市东南 25 华里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座西朝东。石窟前是自东南向西北流淌的大泉河，历史上又名为“宕泉”。河的两侧是连绵起伏的沙丘，东面为三危山，西面名鸣沙山。据唐·武周圣历元年（698 年）五月十四日立《大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当时乐尊法师云游至此，正值夕阳西下，法师抬头观看，眼前展现出奇妙的景色，在夕阳的余辉照耀下，三危山上似有千佛显现在金色的光芒中，虔诚的法师被这奇景所吸引，认为此处是一块圣地，立即募捐，请来工匠开凿了第一洞石窟。此后直至唐代，僧侣、王公贵族、地方小官吏、商人、市民、手工业者等在这里开凿了石窟千余孔，经过 1600 年的自然与人为的损坏，尚存 492 洞窟。洞中存壁画 45000 余平方米，塑像 2300 余身，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是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特别是 1900 年发现了封存了近千年的藏经洞，震惊了 20 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许多汉学家、考古学家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即对敦煌遗书的研究。

## 一、藏经洞与敦煌遗书

藏经洞是指莫高窟第 17 窟。第 17 窟是第 16 窟的附属小窟，位于 16 窟长甬道的北壁内，最早为洪誓影洞（近似于今日之纪念堂）。据《吴僧统碑》、《唐敕河西都僧统洪誓告身碑》及《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记载可知，洪誓，俗姓吴，又称吴和尚、吴僧统。祖籍未详。其父吴绪之曾任建康军使，后戍军甘、肃两州之间。吐蕃占领凉州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移镇沙州，并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发建康军戍镇沙州。吴

绪之及子也随军移驻敦煌。洪氏童子出家，由于悉心研读汉经梵典，兼通番语，主张反蕃复汉，于唐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敕授洪誓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赐紫衣及各色信物，并亲示诏书。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洪誓于沙州敦煌去逝。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寺庙“廪室”（存贮粮食的房间）为影堂。后又改影堂为封存典籍的秘室。从此也可推知 17 窟作为藏经洞的时间最早应在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应在纪念洪誓的人对此事淡漠之后。

藏经洞何时被封闭起来？为什么封存？因没有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现尚且是一个谜，学者们依据各种旁证，陈述自己的假说，试图揭示谜底。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关于封闭的理由有两种假说。

其一，“避难说”，认为因避战乱而封藏。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其理由是藏经洞中卷子所题年号，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公元 976~983 年）及（公元 995 ~ 997 年），卷子中未见西夏文写本；藏经洞被发现时至为凌乱，藏文卷子、汉文卷子、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扰而仓惶出此。近代学者罗振玉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中指出：“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加以象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西夏占领敦煌地区当在公元 1035 年。持此观点的还有姜亮夫、阎文儒等。但对上说持不同意见者有之，马世长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伯希和西夏侵扰说，其理由之一是藏经洞中有遗书纪年最晚是太平兴国和至道，其实不然，现已发现了 1002 年的卷子，可能还有更晚的。另一个理由是洞中未发现西夏文写本。这虽然是事实，然而据此一点，即确定藏经洞于 1035 年前封闭，则未必妥当。西夏未创文字之前，使用汉文和藏文。西夏文字始创于李元昊大庆元年（公元 1036 年）。一种文字从始创到比较广泛流

行使用，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况且敦煌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往一向使用汉字，因而敦煌西夏文的流行，则应当更晚一些。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可知，西夏占领瓜、沙地区之后二三十年内，西夏文还没有流行起来，所以西夏侵扰说是值得商榷的。其他尚有陈垣先生的“宋皇祐（1054年）之后封闭说”，马世长与此观点相同；还有殷晴先生的宋绍圣（1094~1098年）封闭说等。

其二，“废弃说”。此观点是方广锠先生于1988年提的。他在《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一文中认为，“避难”说实难自圆其说。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之废卷与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公元1002~1014年），敦煌已向内地乞求配齐了藏经，也曾从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绵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系避难，它们理应珍藏其中，为何整部《大藏经》未被收藏，所藏的反是残部破卷？因此真正原因并不是避难，而是在于“这一批文书对当时敦煌僧众来说已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废弃。”关于封闭的时间也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倾向于闭封于公元11世纪前后。

1900年（一说1899年）夏历4月28日，莫高窟王圆录道士在清理第16窟甬道时，发现了复壁中的藏经洞，即17窟。窟内藏佛经与世俗文书约4万件，被人们称为敦煌遗书；其它还有纸绢幡画、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法器等。王道士由于无知而未觉其为国宝，仅用此卖钱赠人，换取修窟的用金，但当卷子等散佚他邦，却震惊了二十世纪初的国内外学术界。黄永武先生在《敦煌宝藏》序中感叹云：“敦煌石室宝藏初出壁壤，如浣沙西子，未受珍视，后遭劫掠诈骗，滞留乎异邦，艳色始为天下所重。一时钻研敦煌之风，东起日本，西迄英国，世称显学，而国人于此，八十年来，徒伤美人娟娟，为秋水所隔耳。”现敦煌卷子主要存于英国伦敦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

馆、德国普鲁士学士院及俄国等国家，国内亦存有一少部分佛经以及文书。在这数以万计的写本中有医学卷子写本近百种，为研究唐以前医学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 二、敦煌遗书中的医学卷子

### 1. 医学卷子的种类及成书年代

敦煌遗书中的医学卷子主要包括医经类、诊法类、医术医方类、针灸类、本草类及其他遗书中的医学内容等。医经类主要有：《针经·病形脉诊》残卷（P. 3481）、《素问·三部九候论》残卷（P. 3287）、《伤寒杂病论》残卷（S. 202）、《王叔和脉经》残卷（S. 8289）、《张仲景五脏论》残卷（P. 2115）、《明堂五脏论》（P. 3655）。诊法类主要有：《平脉略例》（S. 5614）、《玄感脉经》（P. 3477）、《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S. 5614）、《占五脏声色源候》（S. 5614）、《青乌子脉诀》（P. 3655）、《七表八里三部脉》（P. 3655）、《不知名脉法》残片（S. 碎片·18）等。医术医方类遗书较多，主要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杂疗病药方》残卷（P. 3378）、《唐人选方》残卷三截（P. 2565、P. 2666、P. 3731）、《黑帝要略方》残卷（S. 3960）、《单药方》残卷（P. 2666）、《备急单验药方》残卷（S. 9987）及《不知名医方第一种》至《不知名医方第二十三种》（编号略）。针灸类主要有：《灸法图》残卷（S. 6168、S. 6262）、《新集备急灸经》残卷（P. 2675）、《灸经明堂》残卷（S. 5737）、《人神流注》残卷（P. 3247）。本草类主要有：《本草经集注》残卷（龙. 530）、《新修本草》残卷（S. 4534）、《亡名氏本草序例》（S. 5968）、《食疗本草》残卷（S. 76）。其他类主要有：《辟谷诸方》、《疗服石方》、《王宗无忌单方》、《陵阳禁方》及佛、道卷子医方等。

因医学卷子的成书年代及抄写年代绝大部分无明确记载，所以主要运用现存医学文献来加以考证。如卷子 S·202，无书名及作者，也无撰年，但据其内容与宋《伤寒论·辨脉法》基本相同，故定名为《伤寒论》，从而也可定其成书年代为东汉。其次还可根据作者姓名定其成书年代，当卷子无传世本、又未署明作者

时，便根据书中引用的书名、人名、历史事件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献资料加以考定。如《不知名医方第六种》与《不知名医方第九种》，均无成书年代及作者，又无传世本可考，但二卷子中均记有“已上药并是大秤大两”之文。据《旧唐书·食货志》：“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始定律令……凡权衡度量之制……三两为大两”。武德是唐高祖李渊年号，此条文字说明，自唐武德七年以后，方开始使用“大两”之制。故此二书的成书年代约为公元 624 年以后，或约成书于唐初。又如《明堂五脏论》未记作者及成书年代，但文中引用了三国吴人吕广《玉匮针经》的佚文，据此可知其撰年约在六朝或唐初。

医学卷子均为写本，大部分卷子未署抄年，仅有个别卷子记有抄年。如《新集备急灸经》卷末载有“咸通二年……通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润二人写记”，即公元 861 年抄写。一般署抄年者则按抄写日期定写本年代。但有时单凭此也不可信，亦应考证。如《本草经集注》卷尾记有“开元六年（公元 718 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近人罗振玉、日人渡边幸三等人认为此即卷子的抄写年代，但日人川琢治从原卷子的书法分析，认为卷末此段文字与全卷本文的书法风格不同，且又不避唐讳，故认为当是六朝时写本。后者的见解似更有道理。

经考证，近百种医学卷子的抄写年代，最早可上限于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是隋唐时期，最晚的写本亦应不晚于五代。

## 2. 医学卷子的文献价值

敦煌遗书保存早期医书数量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明清以来传世的医书较多，宋元医书则已视为珍宝，唐以前医书珍本就更稀少。因此敦煌石窟所存的近百种隋唐间写本医书，虽然多已残缺，但仍可谓无价之宝。从史志目录上看，南北朝至唐末时期的医学著作已相当多，如《隋书·经籍志》记有 129 部，其中除少量系汉、魏著作外，大多是六朝以后的医著，但现存这时期的医书除《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外，余者

大多散佚。因此，敦煌医学卷子可以弥补这一时期传世医书短缺的现状。

敦煌医学卷子保存有目录书记载而后世佚失的著作，如：《张仲景五脏论》、《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另外还保存了大量从未见古簿录及古医籍记载的医学著作。如：《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青乌子脉诀》、《新集备急灸经》、《灸经图》、《唐人选方》、《杂疗病方》等等，这说明隋唐前后医书已远远超出古簿录所采目录的范围。

敦煌医学卷子为校勘传世本古医书提供了早期校本。如卷子本《伤寒论》即传世宋本《伤寒论·辨脉法》。此书未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故更能反映早期面貌，可作为《伤寒论》的早期校本。卷子《伤寒论》更为宝贵的是保存了传世本《伤寒论》缺佚的个别条文。如：“脉虚而不吐下、发汗，其面反有热。今色欲解，不能汗，其身必痒。”“脉微涩，少阴反坚，微即下，逆则躁烦。少阴紧者，复即为难。汗出在头，谷气为下。复难者愈，微溏不令汗出，甚则遂不得便，烦逆鼻鸣，上竭下虚，不得复通。”以上两条均系今本《伤寒论》的早期佚文，可作补佚之用。其他卷子如《平脉略例》、《玄感脉经》、《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均与王叔和《脉经》的部分内容相同，故可作为校勘王叔和《脉经》的早期校本。又如《三部九候论》与《素问·三部九候论》部分内容相同，可作为校勘《素问·三部九候论》的早期校本。

这些医学卷子，还可用来注释传世医书中的难解之词。如传世本《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三种古脉象，即“蠕蠕然”、“浑浑然”、“徐徐然”。唐·王冰注曰：蠕蠕然，“气和故也”；“浑浑，乱也”；“徐徐，缓也”。王注欠明，而卷子本《三部九候论》则对此三种脉象解释为“蠕蠕者来有力”，“浑浑者来无力”，“徐徐者似有似无也”，注文简明易懂，一目了然。又如在古医书中常见到“明堂”一词，有用指帝王宫阙，如“黄帝坐明堂”；有指眉间印堂穴处；另有冠于针灸图上，名为“明堂图”者。前二种词义尚明，后一种则费解。医学卷子《明堂五脏论》中指出：

“明者，命也；堂者，躯也”，即指生命之躯，亦可理解为“人体”之称，用此词义解释“明堂图”，则恰如其分。

敦煌卷子也为辑佚古医书提供了原始资料。据隋唐史志目录所载，已知有些重要古医书亡佚，有的仅在传世医籍中存有散在佚文。《张仲景五脏论》原书早佚，仅有部分佚文散见于《医方类聚》卷四“五脏门”中。敦煌卷子保存了四种《张仲景五脏论》写本，虽各有残缺，但用以互相校补，再参之于《医方类聚》中的佚文，基本恢复了原书面貌。又如《新修本草》自宋以后便无传本，其文散见于后代本草著作中。但敦煌卷子中有四种《新修本草》残卷写本，显然为辑佚此书提供了古传本。

在医学史研究中，有时因史料不足，对确定某一书的成书年代时，往往产生分歧。敦煌卷子则可为医学史上的某些争议提供佐证。如《王叔和脉诀》一书，因其体例与内容都与《脉经》相异，因此历代学者多认为非王氏所作。但作者是谁？成书于何年？又众说纷纭。宋·陈言认为《脉诀》是六朝著作；明·吴昆谓五代所撰；元·谢晋翁又说是北宋熙宁以后。今将卷子本《七表八里三部脉》与《脉诀》对照，发现卷子本与《脉诀》的七表脉、八里脉、三部脉，从文句形式到内容均相同，可以认为《七表八里三部脉》就是《王叔和脉诀》的早期传本，《脉诀》最迟在唐代就已成书。因此，《脉诀》成书于“五代”、“北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又如对《伤寒论·辨脉法》的撰年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谓此篇不是张仲景原撰，是五代高继冲加入的，如日人川越正淑就执此见。卷子《伤寒论》，即传世本《伤寒论·辨脉法》，是唐代写本，因此说明，“辨脉法”最迟亦应系唐末所作。虽然目前不能确定此篇是否为张仲景之作，但可否定系高继冲掺入之说。

### 3. 医学卷子的学术价值

敦煌卷子医籍，是隋唐前后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学经验总结，反映了隋唐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历史概貌，这部分医学理论及临证经验，至今仍是灿然可观的。

①医学理论成就 《玄感脉经》云：“九脏者，形脏四，头角、耳目、口齿、胸中也；神脏五，心、肝、脾、肺、肾也。”其中云“头角”的功能是“精识之主”。关于九脏之说，《素问·三部九候论》虽也有类似的记载，但都未述“头角”为“精识之主”的功能，仅言“上部天两额之动脉”、“天以候头角之气”。“头角”此指头而言。在既知的医学史料中，对头脑具有精神意识的提法，这是最早的。

②针灸学成就 卷子《灸经图》、《新集备急灸经》是唐人写的灸疗专书，也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图谱。图谱中将病证与穴位用线连接起来，可按症索穴，取穴形象准确易明。《新集备急灸经》残卷存12个穴位，《灸经图》残存45个穴位，其中有的穴位从未见于传世针灸书。如“手足髓孔、两脚五舟、天门、阴会”等。又，古人取穴无一定制，如《明堂五脏论》一书所记五脏六腑俞穴部位，多与传世本针灸古医书相异。例如：肺俞、大肠俞当在背第三椎、第十六椎两旁各相去一寸五分，而该卷谓此二俞皆在背“第十三椎两旁各相去一寸半”等。又云：“夫人在身有六百四十九穴，三百六十五穴是气，二百六十五穴是风”，以及“言人身有三百六十識，識之竖也。又有三百八十四魂，魂魄不住，通利往来”等等论述，均从未见于传统中医学理论，这也说明隋唐时期在针灸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学术流派的存在。

③脉学成就 卷子的脉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脉诊方面。敦煌卷子共有七部脉书，这七部是《平脉略例》、《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亡名氏脉经》（两种）、《玄感脉经》、《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这七种脉书分别论述了诊脉部位、方法、脉象特征及主病等问题，其中有的脉学理论直接继承了王叔和《脉经》及《素问》有关脉学理论，但也有与传世古脉学著作记述互有出入或未见者。如《玄感脉经》中的二十三种脉象及主病、六种死脉脉候，《平脉略例》中的十九种脉象及主病，《亡名氏脉经》第二种根据寸、关、尺三部的不同脉象主病所确定的用药处方及针灸法等。

④本草学成就 卷子保存了《神农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亡名氏本草序例》四种重要的本草著作残卷。其中《本草经集注》和《亡名氏本草序例》均残存药物总论，主要论述药物的上中下三品、配伍、气味、采治、剂型、剂量、炮炙、主治功用及药物七情等。《新修本草》在卷子本中虽仅存 46 味药，较原书 850 种相差甚远，但为现存《新修本草》最古的写本实物，因而非常宝贵。《食疗本草》共残存可供食用的药物 26 种，每种又各附有医方，共 82 方。

另外在非本草著作中，还记有地道药材的应用。如《张仲景五脏论》中的“河内牛膝、上蔡防风”等。《不知名医方第六种》及第九种在三等丸方中也记有“江宁地黄”、“河内牛膝”、“高州枳壳”、“华山覆盆子”、“原州黄芪”、“潞州菟丝子”、“澜州蒺藜子”等。

⑤方剂学成就 在近百种医学卷子中，方剂写本最多，有三十多种。另外在佛、道教卷子遗书中也散见有少量医方。现粗略统计在敦煌遗书中，约保存有 1100 余首医方，本书共收录较为完整的医方近五百首（不计“又方”）。这些医方除少量可见于隋唐前后医籍外，大部分是已佚之医方。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记载了已佚汉代方书《汤液经法》中的近六十首医方，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汤液经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揭示出《伤寒杂病论》、《辅行诀》同源于《汤液经法》。将《辅行诀》所录医方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比较，其主要医方相同，仅方名有所差异。其原因是，“张机撰《伤寒论》僻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见《辅行诀》）。”

从“救五脏卒死方”中可以看到在隋唐以前，劳动人民在与突发疾病抗争中，已总结出救治卒死的急救疗法，有的急救方法已比较合理，在当时是世界领先水平。如救治急心痛病人中记载：“着舌以通心气。治中恶急心痛，手足逆冷者，顷刻可杀人。

看其人指爪青者是。消石五钱匕，雄黄一钱匕。上二味共为极细末。启病者舌，着散一匕于舌下，若有涎出，令病者随涎咽下，必愈。”方中硝石清热泻火通便，雄黄解毒杀虫，二药共为极细末，用药着舌下，含之咽下。因心开窍于舌，故可通心气，疗中恶急心痛。此种外治法与现代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有效西药硝酸甘油原理与疗效相近，且早于后者一千余年。

今日之“天王补心丹”，谢观认为首见于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但在敦煌卷子唐人写本佛经（S·5598）末尾发现名为“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补心丸方”，其方名、主治、药物组成和危亦林“天王补心丹”相同，仅个别药有所更换。卷子“天王补心丸”共十七味药，其中“贝母、防风、薯芋、乳糖、甘草”，危氏方改为“玄参、天冬、当归、酸枣、桔梗”五药，据此，天王补心丹在唐代已有此方。

综上所述，敦煌医学遗书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医学文献史料。这对于研究补阙隋唐时期医药学史的不足，印证医药史学历来争议或悬而未决的疑点，发掘中医古代有效的治疗方药，医学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定会从中得到某些借鉴和启示，从而达到继承、发展中医药的目的。

# 目 录

## 绪言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 1 )
(一) 辨肝脏病证文并方	( 3 )
(二) 辨心脏病证文并方	( 5 )
(三) 辨脾脏病证文并方	( 8 )
(四) 辨肺脏病证文并方	( 9 )
(五) 辨肾脏病证文并方	( 11 )
(六) 五脏泻方	( 13 )
(七) 救五脏诸劳损病方	( 15 )
(八) 二旦六神大小汤	( 21 )
(九) 救五脏中恶卒死方	( 27 )
二、天王补心丸	( 28 )
三、黄疸病方	( 29 )
四、反胃方	( 34 )
五、呕吐方	( 36 )
六、消渴方	( 38 )
七、蒸病方	( 41 )
八、腹满方	( 43 )
九、风毒脚气方	( 46 )
十、霍乱方	( 49 )
十一、治一切疰方	( 52 )
十二、主一切恶气方	( 54 )
十三、蛊水方	( 55 )
十四、蛊毒病方	( 59 )
十五、天行、疫疠、传尸病证方	( 60 )
十六、诸痢方	( 69 )